

臺灣學研究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半年刊 28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華民國 111 (2022)年 12 月

評介駒込武著《「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下）》*

李鎧揚**

書名：《「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下）》

作者：駒込武

譯者：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

頁數：944 頁



一、前言

所謂的「私立學校」，一般指稱相對於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不由公費設立，獨立營運的學校。¹近代日本教育體系中學校分為「公立」、「官立」與「私立」三種類。最初 1872 年「學制」中，僅有「官立」與「私立」兩種。當時「官立學校」就是由文部省出資的學校。反之則為私立學校。1874 年起除官、私立外，政府又將由地方民眾出資的學校定義為「公立」學校。²由於之後初等教

*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另外也感謝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新田龍希教授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然限於稿件篇幅與時間，無法全數按照各方建議修正。有關文章內容，全由作者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¹ 梅根悟監修，《世界教育史大系 40：世界教育事典》（東京：講談社，1978），198。

² 田中智子，〈「官立学校」の輪郭：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形成期における概念とその周縁〉《人文學報》，99（2010.12），33-35。

育多由地方民眾或市町村設立，由前述方式設立的小學校幾乎是「公立」（公立小學校）。而中等或高等教育機構多由文部省設立，稱為官立學校。如依據「帝國大學令」（如東京帝國大學）設立的帝國大學或依據「大學令」（如官立岡山醫科大學、官立熊本醫科大學等單科大學）；也包含依據「官立高等中學校令」、「高等學校令」設立的舊制高等學校。以殖民地臺灣來說，舉凡「總督府國語學校」，短暫設立的「國語傳習所」以及 1920 年代「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都算是官立學校。1898 年的臺灣公學校在 1920 年以前，有相當經費是由民眾籌措，只有教師費是由總督府地方費支付，在性質上應屬於公立學校。1920 年後市街庄公共團體成立後，其公立學校的特性更為明顯。反而臺灣小學校最初由總督府經費設立，實質上為官立學校。臺灣小學校 1920 年後才連同地方上公學校改為市街庄設立，成為公立學校。

在近代國家興起後，無論官、公或私立學校，一律必須在政府管理下，符合一定規範才能運作。本書中討論中心「長老教中學校」（今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實際上圍繞著該校從自主到納管後的問題。可以說面對國家的「積極介入」，長老教中學校的對應就是貫串全書的核心議題。作者駒込武的目標，是希望能以日治時期長老教中學校作為分析對象，將日本對臺灣的殖民地統治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思考歷史意義。

作者自己曾戲言，有人質疑他何以要耗費高達九百餘頁篇幅去分析一所基督教中學校，難道「九十頁」還不夠嗎？³但本書是以單一學校或個人史的角度去討論世界史下殖民地支配，其中牽連到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與臺灣的多重關係，是一種從不同帝國角度去詮釋當時臺灣人的集體性主體樣態。單從跨地域性（*across localization*）架構來看，已超越過往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為主要的研究。吳叡人在導論中指出，本書必然會成為一本經典。其核心是日本近代歷史研究傳統，但又跨越了日本傳統使學，連結到比較帝國史、思想史、殖民地研究、帝國史與西洋史等等（頁 ix-x）。本書也的確引起不同研究學者的討論。不僅是殖民地研究或臺灣研究，甚至有研究者企圖從大英帝國史角度對本書進行討論。⁴

³ 本處指稱日文版篇幅。而本書所討論之範圍與引用之頁碼，均以中文版本為主。

⁴ 並河葉子，〈イギリス帝国史とミッション史の文脈から読む『世界史のなかの臺灣植民地支配』〉《社会科学》（京都：同志社大學），48.1（2018.05）：29-39。

二、內容大意

作者將本書架構分為三大部分，加上「序章」與「終章」的話，整體內容來到 12 章。而每一部最後在每一部分中又有小結，實際上更為龐大。作者企圖從「秩序」觀點出發，一方面嘗試描繪出英格蘭宣教師、日本人官僚與臺灣人基督徒輪廓，同時也討論三者在帝國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馬提昇 (Hugh M. Matheson, 1821-1898)、伊藤博文 (1841-1909) 與李春生 (1838-1924) 三位出身與立場不完全一致的人看似無關，但在「文明化」這個架構下，他們軌跡卻若有似無交會。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介紹英格蘭長老教會到臺灣傳教的歷史，並敘述鴉片戰爭後宣教師來到中國的背景。宣教事業也逐漸在中國傳開。許多熟悉的傳教士也在此時來到臺灣 (頁 81-90)。臺南宣教會為了推廣新的書寫體系「白話羅馬字」，因而請求在當地設立學校，新設立的學校由余饒理 (George Ede, 1854-1904) 擔任首校長 (頁 93-94)。在第二章中，作者解釋馬提昇是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等一同前往倫敦時的接待者 (頁 105-110)。伊藤理解到日本歷史中並沒有基督教傳統，要創造出這樣「機軸」作為政治體制核心，只有「天皇」有類似西方基督教的效果，配合憲法與賦予天皇其作為「文明開化先導性」，就能成為統治的基礎 (頁 113)。日清戰爭不僅確立「天皇、軍隊、國家」一體感。在日軍進入臺灣後，當地住民意識到要仰賴宣教師來維護自身安全，此消弭了宣教師原先和部分地方民眾衝突的局面，也讓他們的身份在臺灣有了微妙的變化。從作者對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敘述可以知道，他一方面對臺灣人要被日本這個非歐美先進國統治抱持同情，但也對於儒教權威消失，將有利傳教感到高興。對宣教師而言，日本統治不僅重新定位基督教在臺灣的關係，日本和傳教士更標榜的文明 (如醫療制度) 有相當的重疊性，是可以追求「共榮共存」的對象。在第三章中，作者討論了買辦起家，並在清末時就信仰基督教的李春生。李春生和辜顯榮等人都是首批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臺灣士紳 (頁 163-166)。春生雖然對新政權感到失望，但日本在臺灣實施建設，卻和基督教代表的文明有高度類似性，故仍積極和新政權合作。當時和他一樣的基督徒還有林燕臣 (1859-1944)、黃能傑 (1853-1927) 與高長 (1837-1912)。這些很早就信仰「番仔教」的人，他們的後代以和宣教師關係為跳板，跳脫出中上級教育機構缺乏臺灣，陸續獲得從事專門職業的機會，達成某種意義上的上升流動 (頁 190-192)。李春生看到日本帶來了部分和基督教文明契合的事務，卻也看到統治者「秘其上等教育」之一面，而宣教師就是幫助他們突破的關鍵。對總督府來說，他們當然對於地方上存在著外國宣教師感

到棘手，但因為基督教徒比起一般臺灣人更能接受新式教育。即便教會的自治傳統在總督府眼中並非是值得高興之事，雙方到 1910 年代大體維持和平且友好的關係。

在第四至六章，作者以討論臺灣人的主體性進行的分析。作者在緒章就已指出「臺灣人」並非不證自明概念。1914 年林獻堂（1881-1956）等人和板垣退助（1837-1919）成立臺灣同化會，看似一種否定自我的作法。但從葉榮鐘論述可以知道：「與獨裁沒有權利的狀況比起來，選擇認同根本是次要問題」。因臺灣缺乏初、中等以上教育機構，想要向上流動幾乎不可能，林獻堂等士紳才會發起臺中中學校設立運動（頁 256-262）。與此同時，長老教中學校也進入學制調整期。官方注意到校方企圖透過「私立學校」方式維持教育自主性。在全盤拒絕將會造成更多抗議以及不願意擴大公共性的前提下，官方對於「向學熱」回應方式，是採取限縮學制與規模來處理臺灣人的訴求。一方面設立臺中中學校，卻將學制刻意制定的比本國更低，不允許採取私立方式設立。官方同時在 1919 年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內容中，對私立學校進行規範，都可說是類似構想的延伸。不論是臺中中學校或長老教中學校，其最後設立的樣態都和最初不同（頁 286-289）。在第五章中，作者延續對學校的討論，將核心放在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實施後長老教中學校主事者與官方的互動。新教育令的實施剛好是內地延長時期，萬榮華（Edward Band，1886-1971）希望總督府將長老教中學校納入指定下，這意味著在學制上必須和本國中學校一致（頁 336-344）。但官方並未答允，因此，長老教中學展開成為指定學校認定的運動，也發起了募款活動。然而，長老教中學始終沒有取得資格，無法成為接續上級教育的銜接機構。但因為臺灣總督府對於中等教育機構的限制，導致當時殖民地臺灣缺乏初等以上教育機構，這讓長老教中學仍保有一定就學人數。在 1920 年代中後，隨著來自官方壓力越多，林茂生（1887-1947）等人主張這是屬於「臺灣人的學校」，這樣標榜，無寧說是對於同化壓力下一種反應。在第六章中，作者以林茂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內容進行討論。作者指出，林茂生看似進行博士論文撰寫，實際上卻將他的理想融入其中。如博論終章他針對殖民地臺灣的初、中、高等教育提出改革建議。他在論文提出了和總督府定義不同的「公教育」，同時也批判同化教育政策是違反近代教育常態（頁 429-431）。作者指出林茂生的論點雖混用了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世界主義，也缺乏對原住民高度關心。這看似有點混亂的手段，其實都是打破不平等的一種訴求。但這主要是他回應總督府「多重複雜的支配與壓迫形式」。他所期待的是「缺少政治性解放的世界主義」。在同化主義這個封閉場所，臺灣人拼了全力要突破困境，但只要那股教育熱稍微

噴發，就被立刻被總督府壓抑，導往官方規劃的指定道路上（頁 450-452）。

在第三部中，作者以 1930 年代軍國主義上升為背景，討論日本本國、朝鮮與臺灣三處的排擊運動。在第七章與第八章中，作者討論「上智大學」、「崇實學校」與臺灣長老教中學校如何因為排擊運動而逐漸失去自治空間（頁 493-508）。在臺灣方面，整起事件直接導火線在於，校方不滿日籍教頭上村一仁任意和總督府進行協議將其解聘，但連帶引發校內七位日籍教師聯袂辭職（頁 547-552）。事件擴大後，《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都對此報導，連同總督府與地方官廳，眾人且在立場上對學校強烈批評。批判的聲音甚至延燒到淡水中學與淡水女學院。而林茂生本人，因在上村一仁被解職前與他有過爭吵，導致他自己也被捲入爭議中。林茂生被迫辭去理事長職務，校方進一步處理的措施是進行符合總督府要求的調整，例如參拜神社，設置奉安庫，參與神社祭典。對萬榮華等外籍成員來說，和政府對抗下場就是關閉學校。在不關閉學校的前提下，「臺灣人的學校」這樣的主張自然而然的被擱置在一旁。對林茂生或同樣遭到影響的黃俟命（1890-1991）來說，被理事會要求解職離開，遠比受到日本人批判更令人難受（頁 567-576）。第九章則是在前章基礎上，將焦點放在官方抨擊淡水中學校事件上。在官方最初僅要求淡水中學校進行遙拜，但此後卻陸續要求校方實施參拜神社、舉行節日學校儀式，半數教師採用日人的政策。宣教會即便無奈，在不願與官方衝突之下，對此也都勉強同意。約莫在此同時，外交上發生了「珠諾號事件」（1935 年），這個事件日本政府處理方式讓臺灣軍司令部並不滿意，在臺灣發起了擁護軍機的運動。針對淡水中學校，在臺的在鄉軍人甚至發起了「撲滅淡水中學期成同盟會」，希望能廢止淡中（頁 638-657）。在這件事上，加拿大為主的北部宣教會也做出了退讓，甚至到最後還將部分土地賣給了官方。在 1930 年代後期，長老教中學校取得了私立中學校的認可，但也被迫改名為「長榮中學」。在納入總動員體制後，新的長榮中學校內幾乎看不到自治運作的空間（頁 675-683）。隨著大英帝國與日本帝國關係敵對化，外國籍宣教士難以發揮其「上國」優勢，而臺灣人也只能以「日本人」的身份活下來。在第十章中，總督府對長老教中學校的方針也在朝鮮與日本本國基督教學校發生。大日本帝國對於基督教系學校的壓迫，從內地天主教學校，慢慢到臺灣與朝鮮新教學校，最後又回到日本本國的新教學校。（頁 751-754）

在最終章中，林茂生對 1945 年國民政府在臺北帝國大學接收中，代理校長羅宗洛（1898-1987）大量留用日籍教授與消極地任用臺灣人教職員感到難過。歷經了不同政權，設立臺灣人的學校想法再落空，對國民政府的態度由期待到失望，甚至說出「光復的是臺灣還是日本」這樣的話。這些事情證明了想要設

立屬於臺灣人的學校想法雖然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終究只是一場存在難以完成的夢（頁 799-810）。

三、問題與討論

本書是橫跨了日本、臺灣，甚至包含歐美傳教脈絡的帝國史研究，但隱含了作者對以往殖民地研究的一種檢討。作者在緒言中強力批判少數當前日本的殖民地研究者只以日本人與歐美人為主體，大多看不到被統治者的在統治中呈現的複雜情況。作者認為只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種關係，既無法看透帝國的全貌，也無法進一步理解地方社會。作者巧妙地利用長老教中學校串起了千絲萬縷的連結。進一步論述臺灣人在多重關係下如何利用宣教師與總督府協調，構築出一條官方路線外的教育自治空間。針對本書寫作策略，筆者認為可從幾個點進行觀察。

首先，以往臺灣史研究在討論宣教士時，多僅注重其在臺傳教經過與貢獻，或專注於彼等對臺灣所見事務觀察。忽略了來自歐美的宣教師在面對日本這個「後進帝國主義」具有優勢。沒有他們，臺灣人在 1895 年後就沒有在夾縫生存，追求教育自主性的可能性。三角關係也就直接成為上對下從屬。作者欲提醒讀者的是，長老教會宣教士對日本並非毫無期待，因為基督教文明背後代表的歐美文化，與日本明治維新仿效西方實施的「文明開化」一連串措施具有相當類似性，雙方並非沒有共同的基礎。宣教師不全然是偏向臺灣人這一方。宣教師的存在，提供西方、日本與臺灣多重關係的要件。這樣的討論，在目前臺灣史研究中是少見的。

其次，本書提供臺灣研究來自教育現場的「反抗」或「抵抗」之外觀察視角。多數研究者在討論殖民地臺灣教育制度時，雖已逐漸走出制度史研究，聚焦於當時學校帶給地方社會的變化，又或者關心教育方針改變背後的意義。在此以前，幾乎都忽略或難以相信「學校」這樣高度被規訓的機構竟然存在著長期抵抗可能性。若林正丈在討論總督政府與本地資產階級關係時，雖然敏銳地注意到本地地主透過協助總督府理蕃事業，換取臺中中學校設立的「仲介-交換」機制，但該校設立的結果，並沒有比照臺灣人想要的本國中學校規格，而是在就學年限上刻意縮減。⁵ 本書對長老教在 1910 年代尋求設立一所「臺灣人的學

⁵ 若林正丈，〈總督政治與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收入氏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度史研究》（臺

校」來看，隈本繁吉等官員之所以願意以設立學校換取資助理蕃事業，主要還是總督府能夠以「公立」來控制學校，對教育有更多主導權。當時的臺灣士紳在對教育迫切渴望下，只能「飢不擇食」地接受這個不完美方案。透過作者對長老教中學校這所「私立」學校討論，對 1910 年代總督府教育官僚主導的教育方針時有更深刻理解。

不僅如此，以往我們將社會運動想像成是由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或臺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等團體所進行的活動。一方面是因為臺灣知識份子的確以這些團體作為改革社會的主要組織，同時也被寫入《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但透過學校制度調整，更能夠更容易觀察教育主張的延續或斷裂性。以長老教中學校來看，一條追求「教育權自主」或「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路線在 1920 年代隱然成形。從官方在 1919 年首次臺灣教育令中刻意排除私立學校規範明確化，並有意識地在規定上不使用「參拜」等字眼，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抵抗。抵抗不一定需要搖旗吶喊，也有極力避免遵守規定的軟性呈現方式。

作者對長老教中學校的討論，也替誰才是殖民地臺灣第一個招收臺灣人的中等教育機構進行了釐清。許多人公認臺中中學校才是第一個設置的中學校。但近代日本教育屬於天皇大權，包含殖民地在內教育事項必須以「敕令」加以規範。⁶從 1898 年的臺灣公學校到 1928 年的臺北帝國大學都是如此。臺中中學校的設置是以總督府以「府令」（1915 年府令第 2 號）來規範，都說明該校並非當時學制上真正の中學校，只是回應知識份子訴求的「類中學校」。⁷即便臺灣人畢業於臺中中學校，也無法直接銜接上高等學校。長老教中學校這所以招收臺灣信徒為主的學校，在 1905 年總督府著手針對私立學校進行管理時，早已認定長老教中學校是初等以上學校（high school）。⁸從長老教中學校招收規定上規定入學資格在 12 歲以上進一步得到印證。之後長老教會欲在彰化設立小學校時，也是用「臺南長老教中學校附屬小學校」。從這些檔案與法規來看，

北：播種者出版，2007），347-385。

⁶ 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都分別各自有其官制令。

⁷ 《府報》，號外，1915.02.03。

⁸ 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1991），61-62。「臺南長老中學校豫備科設立認可（英國人ダンカン、フアルガツソン）」（1912.11.01），〈明治四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十六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502010。相關檔案至今還保留在長榮中學校史館。

很難說臺中中學校是第一個招收「臺灣人」為主的「中學校」。⁹筆者認為，既然「長老教中學校」與「臺中中學校」均不符合日本教育法體系對「中學校」的定義，兩者也都是以招收臺灣人為主的學校。那麼就時間先後順序來看，1906 年被總督府認可的長老教中學校（設立之時名稱為「長老教會高等學校」）應該才是第一所臺灣人的「中學校」。¹⁰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 1913 年長老教中學校變更學則一案中。可清楚看到長老教中學校在 1913 年申請調整課程與修業年由四年制改五年制。在校方給總督府以及臺南廳長給總督府的公文內，臺南廳甚至一度以「中學科」來稱呼該校課程。¹¹因此，長老教中學校似乎才是第一所以臺灣人為主的中學。

在閱讀本書後，筆者也希望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與作者討論。作者在緒章提及臺灣與朝鮮在私立學校上具有相當差距。朝鮮在 1920 年代有七百餘所學校，但同時其的臺灣僅有 22 所。如果私立學校的定義是指適用於 1905 年臺灣總督府府令 88 號「私立學校規則」的學校，那麼在數量必定不會太多。¹²但若納入當時相當普遍且作為代用公學校的「書房」來看，則數量上差距也許就會與朝鮮拉近不少。1898 年總督府統計全島有 1,707 所書房，其中以臺北縣有 382 所最多。¹³1922 年版的臺灣教育令實施後，新修訂「私立學校規則」已經將書房納入管理。書房在 1920 年代的十年間，核准設立的書房有 130 至 160 所，學生數量也接近公學校學生約一成五到兩成之間。¹⁴雖然從作者文脈上下文來看，臺灣私立學校數量並不影響推論，書房這樣的公學校替代品和臺灣知識份子追求的中等教育機構無關，仍容易造成讀者誤解的可能。

第二，本書第六章針對林茂生博士論文之提出「公共性」，林茂生將林獻

⁹ 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61-62。

¹⁰ 長榮中學最初在 1885 年設立時校名為「長老教會中學」。1906 年年臺灣總督府准予設校，改稱「私立臺南長老教會高等學校」。1908 年改為「基督教萃英中學」，1912 改稱「長老教中學校」。1922 年後稱「私立臺南長老教中學」，1939 年改稱「私立長榮中學校」，戰後改稱「私立長榮中學」，1949 年改稱「臺灣省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527。

¹¹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學則中變更」（1913.12.01），〈大正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一卷司法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260028。

¹² 「私立學校規則」（1905.11.29），〈明治 38 年 11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8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871a001。

¹³ 上沼八郎，〈臺灣における書房「教科書」と日本認識について：植民地教育史研究ノ一ト-6〉《高千穂論叢》，29.2（1994.12）：86-87。

¹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1（1988.05）：102-108。

堂、辜顯榮等形容是「富有公共精神的臺灣漢人」(public-spirited Formosa Chinese)，且臺中中學校是「首間由當地人公共地創設的中學校」。作者認為林茂生尋求確切翻譯時，自身也在思考對臺灣人而言「公共性」意義是什麼。筆者對「富有公共精神的臺灣漢人」這個說法抱持著疑問。1910年代知識份子的確渴望一所學校，但林獻堂曾對教育官員提及：「富豪士紳階層，對於子弟和被使喚下階層子弟於公學校中共學難以忍耐，為此在不得已情況下將子弟送往本國留學」。這說明臺籍仕紳雖對學歷有著渴望，卻也對和普通子弟唸書感到不滿。¹⁵從日後臺中中學校學生家長職業別來看，不僅地主居多，且資產在五千元以上的監護人者超過九成。¹⁶1917年報紙提到臺中中學校父兄資產調查，在第二學年與第三學年185位學生資產調查中，一千元以上21名，五千元以上26名，一萬元以上99名，五萬元以上19名，資產十萬以上的有20名。¹⁷該校家長之雄厚背景，從報紙中可窺知一二。表面上看起來臺中中學校並沒有排他性，但因為殖民地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設立後的實際結果就是多數學生都來自富裕階層的後代，即使林獻堂等人是具有「富有公共精神」，在多數學生來自富裕階層這一點上，應該也是打了折扣的公共精神！¹⁸

第三，作者在討論林茂生針對來自理事會與總督府責難的內心掙扎，並將1934年他在《臺南新報》上發表的綱要視為被迫讓步的行動。但在蔡培火1931年4月21日的日記內就已提及林茂生主張要參拜神社。林茂生認為：「若不參拜神社，學校也無法取得許可。但若如此，則宣教師恐會撤出，必須要加以商議」。蔡培火因此批判林是「貪著做官而忘卻長老教中學者」。¹⁹在萬榮華牧師(Rev.Edward Ban)回憶中，理事會態度是反對參拜的。²⁰即便林茂生對參拜內

¹⁵ 上沼八郎，〈臺灣における書房「教科書」と日本認識について：植民地教育史研究ノ一ト-1〉《高千穂論叢》，26.3 (1991.12)：255。

¹⁶ 朱珮琪，《臺籍精英的搖籃：臺中一中》(臺北縣：向日葵出版社，2004)，90-91、138-140。

¹⁷ 〈地方近事 臺中〉，《臺灣日日新報》，1917.04.24，3版。

¹⁸ 上沼八郎，〈臺灣における書房「教科書」と日本認識について：植民地教育史研究ノ一ト-6〉，86-87。

¹⁹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171。1931年4月21日。

²⁰ 萬榮華牧師回憶：「學校理事會(Board of Managers)討論決定反對順從這條件，覺得順從等於宗教自由的喪失。神社參拜是否帶有宗教性質，需要澄清，未澄清前理事會不願妥協。我們也徵求基督教界的意見。面部臺灣基督教會大會表達，若不是神社的地位明確，大會反對這神社參拜。日本基督教教育協會以及全國基督教會議對我們所持「神社參拜」的立場表示同情，但是對臺灣政府當局亦無

心有過掙扎，但他在 1931 年回臺後應已決定採取妥協路線了，不用等到 1934 年。如此推論，則上村一仁「被辭職」就不見得是林茂生內心轉折的關鍵點。在蔡培火的理解中，上村事件不過是「林一派利用後援會及財團理事會之決議迫村上辭職」。²¹在 1931 年至 1934 年間，林茂生究竟是存在著「支持-反對-被迫同意」的轉折掙扎，還是自始至終採取同樣立場呢？針對此點，作者並無進行太多的討論。

最後，筆者想針對作者林茂生不滿戰後初期臺大校方留用日籍教師或有限度錄取臺籍教授一事提出討論。文章中及戰後臺灣大學在留用過日日籍教師，除醫學院臺灣人助教較多，其他均屬少數，特別是在文學院與理學院臺籍教師偏少。部分臺灣知識份子在日本投降後，確有取代日本人構想。杜聰明就曾對奉命接收臺大羅宗洛表示希望能多用臺灣人的看法，並稱眾人均欲不歡迎日籍教師。²²但羅宗洛在同年 10 月 23 日就曾和一預科學生見面，那位學生所提的主張中，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校方能留用熱心的日籍教師。²³由此可知，並非所有人均希望日籍教師離開的學生。且以戰後初期聘用臺灣人最少的臺大理學院臺北帝國大學至 1945 年的 17 年間，理學部 72 位畢業生中僅 8 位臺籍，直到終戰時才培養出首位臺籍理學博士劉盛烈。²⁴在這樣情況下，想要以臺人補足原來教授空缺是有相當困難性。

前述的觀點，嚴格來說，都不過是在枝微末節中提出看法，有雞蛋裡硬要挑骨頭的味道。即便這些問題無法解決，也無損全書的架構。筆者和作者一樣，都希望透過此次的討論，能夠對殖民地臺灣的地方社會有更多的理解。

可奈何」。《臺灣教會公報》，2452，1999.02.28。轉引自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http://www.laijohn.com/book5/487.htm>。

²¹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生平與交友》，297。1934 年 4 月 19 日。

²²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收入李東華等編，《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200-201。

²³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207。

²⁴ 林忠勝編，《劉盛烈回憶錄：我與臺大七十年》（臺北：前衛，2005），43。